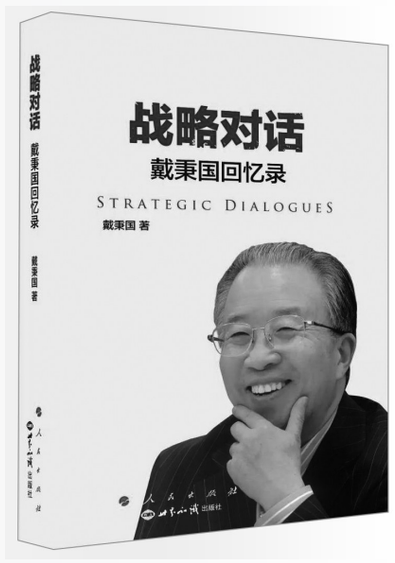
大有读书茶座

中央党校举办第十三期大有读书茶座



□ 杜奉瑛

9月22日晚，原国务委员戴秉国以“战略对话——我所亲历的外交风云”为主题，在培训部第十三期“大有读书茶座”上与中央党校学员座谈。常务副校长何毅亭，校委委员、培训部主任罗宗毅出席。

戴秉国从历史与现实、继承与创新、理论与实践三个维度，回顾和追忆了十年“战略对话”的特殊外交经历，从“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很了不起的党”“新中国外交着眼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正确认识自己和正确认识世界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展望未来要有足够的忧患意识准备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等四个方面，着重解读了在大调整、大重组、大格局的国际局势中，如何通过战略对话实践中国特色的大国外交。他还就外交热点问题进行了精彩而精准的评论与思考，与现场的近百名学员“面对面”亲切交流，深度互动，分享人生感悟。

何毅亭代表校委作了热情洋溢的欢迎词，并在总结讲话中高度评价这次读书活动，认为是一堂高水平的国际视野课、战略思维课、科学方法课和党性教育课。

与会学员一致反映，演讲主题鲜明，内容丰富，有广度、有深度，展现了我国大国外交的丰硕成果，帮助大家拓展了国际视野，廓清了思想认识，提升了战略思维。短短两个小时，立足国情，纵论世界，让人终生受益。

这次读书交流活动是大有读书茶座在本学期的第一场，由中青二班三支部承办，环球时报副总编辑段静涛主持。中央党校办公厅主任欧亚平、培训部副主任李作钦、出版社副社长崔宪涛参加。

国企供给侧改革如何发力

序与跋

□ 贾 康

《国企供给侧改革难点与对策》是一本研究国有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力作，研究问题引出对策，主要回答了以下问题：国有企业为什么要搞供给侧改革？现在遇到了什么问题？怎样基于去产能等形成优化的动力机制？

经济学是一门与实践密不可分的致用学科，新供给经济学是中国本土研究者怀抱“经世济民”情怀与追求发展起来的。我很期待这样取向上的学术理论研究能够避免走入“空谈误国”的迷途，而实实在在地做到胸怀世界、脚踏实地，在“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道路上为中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服务。当然，也包括为国企的改革与发展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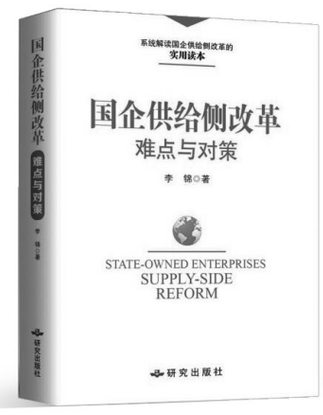
本书作者李锦强调，供给侧改革本质上是实体经济的回归。经济生活中供给的主体是提供产品与服务的经济组织——企业。供给侧改革的出发点是搞好企业，增加有效供给。书中提出，我国“供给侧改革”外部动力是政府，内部动力是企业。国企进行供给侧改革，从消化过剩产能开始；政府支持国企供给侧改革，从降低成本开始。通过改革来构建“新动力”，通过调整来优化新结构，通过创新来提供新供给。作者的这些观点，寻求理论与实际的结合，显得明快而通俗。

供给侧改革国家层面的措施涉及五大要素，包括：调整人口政策，从控制人口数量转向优化实施人力资本战略；积极审慎推动土地制度改革，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土地流转制度；全面实施金融改革，积极解除“金融抑制”，有效支持实体经济；切实通过改革，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大力实施教育改革和创新驱动战略，培育高水平人才，有效建设创新型国家。显然，国有企业改革要顺应经济社会转轨和全面改革要求，促进国有资产收益和存量的转置，是供给侧改革重要的组成部分。国有企业改革，离不开我国行政、财政、收入分配、价格、投资与社会保障等多方面的综合配套改革。

当前，我国经济仍面临严重的供给约束和供给抑制，是我们在深化改革中所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新供给经济学的理论创新努力，是在供给侧打通物质生产力和人际生产关系的视角，把制度创新、管理创新、技术创新的互动与结合处理好，而三层互动里面最关键的，是要把握好以制度供给为龙头的全面改革阶段的攻坚克难。中国的国有企业作用不可低估，但国有经济领域又存在旧体制的弊病与问题，国有企业改革应该去除过度垄断因素，促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能够在一个公平的、良性的市场环境下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譬如混合所有制改革，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实现形式，是要在现代企业制度框架下，追求在每一个企业内部充分地让公的、非公的，国的、非国的股权混起来，寻求共赢发展、包容性发展。

在供给侧改革中，政府要为企业经营创业活动“松绑”“减负”，激发微观经济活力。政府最重要的是要建设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要建设法治化市场体系，而不是直接去确定攻关目标、确定技术路线、给企业许多补贴，削弱市场竞争机制作用。结合当前改革深化情况，应以“负面清单”原则取向，创造“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一是以自贸区为标杆，进一步简政放权，降低门槛、减少准入控制，同时改革监管方式，优化服务，推动全国统一的行政审批标准化改革，建立覆盖所有法人、自然人的全国性信息信用系统，执行统一的市场监管规则，以此最大程度地减少企业的社会交易成本，为企业创造良好的经营环境。二是适度降低我国社保缴费率，同时加快推进实施基本养老社会保障全国统筹步伐；建立全国统筹的社保体系可结合调入国资经营收益等机制。三是进一步清理收费，降低企业实际综合负担特别是税外负担。书中提出，要通过简政放权，把原来政府掌握的权力放给市场、放给企业，让市场活起来，让企业愿意去生产（增加供应）；把原来国资掌握的部分行业放给市场、放给社会，让社会资本愿意投入企业（增加供应）。通过供给结构调整这种宏观调控，着力激活微观活力，在减税、金融改革等方面，努力帮助企业降低成本，这有利于提高企业发展能力，增加有效供给。

（本文摘编自《国企供给侧改革难点与对策》一书的序，题目为编者所拟）



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



□ 曹 猛

《魏略》记载：“诸葛亮在荆州，与石广元、徐元直、孟公威俱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夕，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人曰：‘卿三人仕进，可至刺史郡守也。’三人问其所至，亮笑而不言。”后来诸葛亮官至蜀汉丞相，而石广元三人果真只任至郡守一级官职。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即提纲挈领地领会精神实质和要点的读书方法。

《三国演义》里多次写到诸葛亮深夜还在勤奋读书。他的“观其大略”读书法，既不是精读，也不是泛读，而是一种略读。后来晋代陶渊明也用此法读书，自称“好读书，不求甚解”。唐代李白对这种读书方法极为赞赏，他在《送孟赞府兄还都序》中说：“孔明披书，每观于大意”，他自己也用此法“览于载百家之书”。事实上，诸葛亮“观其大略”读书法并非是对书籍作泛泛浏览、走马观花，而是分清主次轻重、求其精意、得其神蕴。他不是在细枝末节上纠缠，而是在勤奋读书中广泛涉猎，对书籍作概括的认识，从中领会要旨，并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

“观其大略”读书法，从字面看似简单，实则不然。“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无论站在什么角度，无论高低远近，横看侧观都不能看清庐山全貌，因为“身在此山中”。看清庐山的全貌，需要“观其大略”。观察一个具体事物尚且如此，掌握一种理论，懂得一种思想，明白一个道理，就更不容易了。所以“观其大略”读书法实在不是容易之事，必须站在可以“观其大略”的方位上，而这个方位要有理论高度，还要有现实高度。这个方位不好找，也不好站。诸葛亮最喜欢先秦的《左传》，可谓爱不释手。《左传》是鲁国史官左丘明以鲁史为线索，以鲁国十二位国君的谥号为次序，记载了春秋各国的重要史实。他的父亲也很重视《左传》，还经常要求诸葛亮写出认识和体会，而诸葛亮每次都一挥而就，切中要义。正是因为诸葛亮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深厚的文化知识、高超的思维能力，才能够做到读书“观其大略”。

每一本书都有它最精粹的东西，抓住了它就能较好地把握书的精髓要义，从而达到事半功倍和融会贯通之效。“观其大略”读书法要求读书者快速掌握书中的逻辑、方法和思路，不被局部所迷惑，不被细节所羁绊。

读书方法

州县官：权大还是权小？

——中国传统县域治理的一个悖论及启示

我们在讨论县域治理现代化具体问题的时候，不可不深思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的内在悖论及其破解之道。

□ 彭润金

瞿同祖在《清代地方政府》中指出，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的核心内容，是州县官一人负责的“一人政府”。具体说来，州县政府职能全部由州县官一人负责，配置到州县的主要公共权力都由州县官所独揽。其他州县佐杂僚属，只能扮演配角；除非得到州县官的委派，否则没有实质性公共权力。州县官是整合州县一切公共事务与政府职能的关键枢纽，透过州县官的行为即可考察州县的政治。魏光奇在《有法与无法：清代的州县制度及其运作》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的核心内容可概括为州县官的“独任制”。换句话说，州县官集民政、财税、审判、治安、教化等政府职能于一身，对辖区内全部行政事务享有全权、负担全责。概括来看，州县官的“一人政府”也好，州县官的“独任制”也罢，给人的印象是州县官的权力很大。然而，在中国县域政治传统之下，州县官究竟是权大还是权小，恰恰是人们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州县官权力很大。比如，清人汪辉祖认为，州县官的实权大，仅次于总督、巡抚，“虽藩、臬、道、府弗若也”，也就是说，连道台、知府甚至是省级官员布政使和按察使都没有州县官的实权大。清人徐鼒也指出，州县官直接治理百姓，对百姓的实际支配权最大，“一邑之人，仰印官为安危”。州县官高兴了，好比百姓的衣食父母；州县官发怒了，百姓就有破家灭门之祸。因此，百姓都得唯州县官马首是瞻，甚至不需要理会省级高官的命令，所谓“虽有大宪之令，而印官不令之行，不行也；虽有大宪之禁，而印官不禁之止，不止也”。

另一种观点认为，州县官权力很小。主要理由有三点。

首先，众多的上级官员对州县官的制约监督和掣肘干扰。国家大大小小的政务，无不由州县直接办理。之所以在州县之上层层设置上司官员，主要是君主专制中央集权体制下监督州县官员的需要。一方面，在这种“以官治官”的州县监督机制中，各级上司掌握着州县官的仕途沉浮。州县官的考绩，除钱粮征收和盗案破案率外，往往别无客观标准，全凭上司“自由心证”。每三年一次的州县考绩，由知府、道台、藩司、臬司乃至巡抚、总督逐级对州县官出具考评鉴定。由于执掌不同，不同上司往往会做出不同的评判。这必然导致州县官与各级上级之间关系的严重扭曲。另一方面，督抚监司等上司对州县行政往往实施限制与干扰，使得州县官施政自主权和积极性严重受限，难以根据基层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兴利除弊。主要表现在：州县常规行政事务之外，受到既定文法的严格限制，往往被各级上司衙门的书吏们仗势刁难和肆意干预；州县兴利除弊的政策很容易受到上司主观意志的阻碍；各级上司往往发布不切州县实际的政令，州县行政受到极大干扰，难以根据实际情况施政；各级上司发布政令后的督导检查加重州县负担，各级上司派出的督导检查人员往往假公济私、敲诈勒索，派员督导检查制实际成为补贴候补官员和调剂清水官员的摊派勒索制；州县官必须殚精竭虑以奉承伺候好关键上司为第一要务，治民理政反而没有时间精力用心实干。

其次，繁琐的文簿册报制度对州县官的束缚。通过簿册审核来监督、检查和审核州县行政的制度，主要是中央集权体制需要防范官员作弊，制度设计体现着深刻的法家以法治国理念。所谓任法不任人，就是要依靠繁密苛细的文法簿书来监督、检查和审核州县行政。但是，因为州县行政属于专门学问——“吏道”，所以，不仅“窃取名誉侥幸科目者”无法承担，即便熟读儒家经典且德行、文史出众者也未必能够胜任——“虽孝如曾、闵，未必真知国之宪法也”“虽文如班、扬，未必能通民之利弊也”。此外，州县官任期短暂且常有更调，对于各地、各部门的行政事务来不及了解，所以只能靠胥吏来处理这些数量繁多的簿书，其结果就是，本来应该属于“官”的行政权力落入胥吏之手，“官治”变为“吏治”，以至于清人认为“我朝与胥吏共天下”。

再次，非理性的问责处分制度对州县官的“折磨”。州县官可谓有限的权力、无限的责任。州县官的行政问责处分制度，近乎一种无限责任制度，这种制度要求州县官对于辖境内的所有事故负责，将他们不可能凭借自己的职务权力而保证完成的工作，规定为州县官的职责，并在这一范围内对他们实施问责处分。在很多情况下，州县行政的缺失并非州县官的责任，但在当时的问责制度下，却不分青红皂白一律给予处分。因此，这种非理性的行政问责处分制度非但未能改善州县施政，反而产生了很多负面效应。比如：州县官为规避处分，纷纷作弊；州县官正常的施政受到极大负面影响；助长了州县政治的腐败。

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州县官的权大还是权小问题，实际上揭示了中国县域政治传统的一个悖论：从县域施政的公共权力配置看，州县官的权力太小：受到多方掣肘、干扰、束缚甚至折磨，难以施展治县兴县、为民做主的理想抱负。但是，从县域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看，州县官的权力太大：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民众监督太难，州县官能够轻易地凌驾于百姓之上予取予求。

上述悖论产生的根源何在？在中国传统的官府本位、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下，统治者为了防范权力流失，用监司、文法束缚官员的施政；而为了靠官吏维持统治、镇压反抗，又必须维护他们的权力，放纵他们对百姓进行盘剥、迫害。就此而言，清代州县监察机制既不能制约州县官做坏事，更不能激励州县官做好事；州县官做坏事容易，做好事反而很难。这就是官府本位的必然结果。君主要统治和剥削广大的臣民，需分而治之：以官统吏，以吏治民；为了防范官员的道德堕落，又不得不以官治官，使之叠床架屋、相互掣肘；最后君主凌驾于所有臣民之上。这里蕴含着中国传统的法家政治理论。历史证明，这个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难以克服内在的悖论，往往陷入周期性治乱循环，最终为时代和人民所抛弃。

“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我们有必要放宽历史的视野，从中国县域政治传统之中获得启示。一方面，要实现县域公共权力配置的科学化，将治县兴县必需的权力放足放到位。另一方面，要实现县域公共权力监督的民主化，将人民群众的参与、法律制度的规范等做实做到位。

干部国学苑

用典释义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讲话原文】

人民立场是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党与人民风雨同舟、生死与共，始终保持血肉联系，是党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正所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年7月1日）

【出处】

《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春秋）曾参《大学》

【解读】

《大学》是一部在古代中国社会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儒家经典，它系统阐述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展现了古人对实现和谐有序社会的向往。

《大学》多次引用并阐释《诗经》中的诗句。原典中的“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出自《诗经·大雅·文王》。丧师：失去民众；仪：当作“宜”；峻命：大命，即天命。意思是说，商没有失去民心的时候，还能与天意相称。我们应该以殷商为戒鉴，天命才不会变更。《诗经》上述诗句体现了“天命靡常”的思想，进而得出如下结论：“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道：指治国的道理。意谓得到民众的拥戴就能得到整个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整个国家。这句话与孟子的“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一样，都阐述了民心向背关乎国家兴亡的道理。

“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强调了民众的重要性。《大学》还说：“尧、舜帅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帅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尧、舜由于实行了仁政就得到民众的拥护，从而实现了天下大治；桀、纣由于实行了暴政导致民众的反对，结果天下大乱，政权颠覆。这是对“仁政”之利与“暴政”之弊的历史佐证，也是对民众力量的正确认知。所以《大学》告诫说：“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矣。”统治者不可以不谨慎，稍有偏失就会被民众推翻。为此，就要做到“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同“灾”）必逮夫身”。体现了儒家对民心民意的高度重视。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的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借两千多年前的这句古语阐释“人民立场”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政治立场。在95年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中，我们党正是由于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才跨过一道又一道沟坎，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95年来取得的一切成就，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同中国人民接续奋斗的结果。党的根基在人民，党的力量在人民，只有不忘初心，才能继续前进。

（杨立新）